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学术研究方法论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德] 谢林 著 先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谢林著作集

先刚 主编

学术研究方法论

*Vorles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s
akademischen Studiums*

〔德〕谢林 著 先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研究方法论/(德)谢林著;先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301-29688-2

I. ①学… II. ①谢… ②先… III. ①学术研究—研究方法 IV. ①G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5302号

- 书 名 学术研究方法论
XUESHU YANJIU FANGFALUN
- 著作责任者 (德)谢林著 先刚译
- 责任编辑 王晨玉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88-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szw@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2025
-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千字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7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说明

如果从谢林1794年发表第一部哲学著作《一般哲学的形式的可能性》算起,直至1854年在写作《纯粹唯理论哲学述要》时去世为止,他的紧张曲折的哲学思考和创作毫无间断地整整延续了60年的时间,这在整个哲学史里面都是一个罕见的情形。^①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神圣家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里面,谢林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诚然,这个评价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地评估了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功绩和定位,但另一方面,它也暗含着一个贬低性的判断,即认为谢林哲学尚未达到它应有的完满性,因此仅仅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铺垫和准备。这个判断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黑格尔逐渐登上哲学顶峰的过程中,谢林的哲学思考始终都与他处于齐头并进的状态,而且在黑格尔于1831年去世之后继续发展了二十多年。一直以来,虽然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都曾经对“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个近乎僵化的思维模式提

^① 详参先刚:《永恒与时间——谢林哲学研究》,第1章“谢林的哲学生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43页。

出过质疑,但真正在这个领域里面给人们带来颠覆性认识的,乃是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于1955年发表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德国唯心主义在谢林后期哲学中的终结》^①。从此以后,学界对于谢林的关注度和研究深度整整提高了一个档次,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趋向于这样一个认识,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谢林才是德国古典哲学或德国唯心主义的完成者和终结者^②。

我们在这里无意于对谢林和黑格尔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妄加评判。因为我们深信,公正的评价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人们对于谢林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典著作。进而言之,对于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来说,无论他的重心是放在四大家里面的哪一位身上,如果他对于另外几位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很难说他的研究能够获得多少准确而透彻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谢林著作的译介尤其是一项亟待补强的工作,因为无论对于康德、黑格尔还是对于费希特而言,我们都已经拥有其相对完备的中译著作,而相比之下,谢林著作的中译仍然处于非常匮乏

① Walter 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Stuttgart, 1955; zweite Auflage, Pfullingen, 1975.

② 作为例子,我们在这里仅仅列出如下几部著作:Axel Hutter, *Geschichtliche Vernunft: Die Weiterführung der Kantischen Vernunftkritik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Frankfurt am Main, 1996; Christian Iber, *Subjektivität,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Prag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Deutschen Ide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1999; Walter Jaeschke und Andreas Arndt, *Die Klassisch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Kant: Systeme der reinen Vernunft und ihre Kritik (1785-1845)*. München, 2012.

的局面。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出版规划,希望以此推进我国学界对于谢林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工作。

中文版《谢林著作集》所依据的德文底本是谢林去世之后不久,由他的儿子(K. F. A. Schelling)编辑整理,并由科塔出版社出版的十四卷本《谢林全集》(以下简称为“经典版”)①。“经典版”《谢林全集》分为两个部分,第二部分(第11—14卷)首先出版,其内容是晚年谢林关于“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的授课手稿,第一部分(第1—10卷)的内容则是谢林生前发表的全部著作及后期的一些手稿。自这套全集出版以来,它一直都是谢林研究最为倚重的一个经典版本,目前学界在引用谢林原文的时候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以这套全集为准,比如“VI, 60”就是指所引文字出自“经典版”《谢林全集》第六卷第60页。20世纪上半叶,曼弗雷德·施罗特(Manfred Schröter)为纪念谢林去世100周年,重新整理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谢林全集》②。但从内容上来看,“百周年纪念版”完全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只不过在篇章的编排顺序方面进行了调整而已,而且“百周年纪念版”的每一页都标注了“经典版”的对应页码。就此而言,无论人们是使用“百周年纪念版”还是继续使用“经典版”,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差别。唯一需要指出的是,“百周年纪念版”相比“经典版”还是增

① F. W. J. Schelling, *Sämtliche Werke*. Hrsg. von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Cotta'sche Buchhandlung, 1856-1861.

② *Schellings Werke. Münchner Jubiläumsdruck, nach der Originalausgabe (1856-1861) in neuer Anordnung*.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1927-1954.

加了新的一卷,即所谓的《遗著卷》(Nachlaßband)^①,其中收录了谢林的《世界时代》1811年排印稿和1813年排印稿,以及另外一些相关的手稿片断。1985年,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又编辑出版了一套六卷本《谢林选集》^②,其选取的内容仍然是“经典版”的原版影印。这套《谢林选集》因为价格实惠,而且基本上把谢林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收录其中,所以广受欢迎。虽然自1976年起,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启动了四十卷本“历史-考据版”《谢林全集》^③的编辑工作,但由于这项工作的进展非常缓慢(目前仅仅出版了谢林1801年之前的著作),而且其重心是放在版本考据等方面,所以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来说暂时没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来,“经典版”《谢林全集》直到今天都仍然是谢林著作的最权威和最重要的版本,在谢林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我们把它作为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底本,这是一个稳妥可靠的做法。

目前我国学界已经有许多“全集”翻译项目,相比这些项目,我们的中文版《谢林著作集》的主要宗旨不是在于追求大而全,而是希望在基本覆盖谢林的各个时期的著述的前提下,挑选

① F. W. J. von Schelling, *Die Weltalter. Fragmente. In den Urfassungen von 1811 und 1813.* Hrsg. von Manfred Schröter. München: Biederstein Verlag und Leibniz Verlag, 1946.

② F. W. J. Schelling, *Ausgewählte Schriften in 6 Bänden.* Hrsg. von Manfred Fran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③ F. W. J. Schelling,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Im Auftrag der Schelling-Kommissio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von Jörg Jantzen, Thomas Buchheim, Jochem Hennigfeld, Wilhelm G. Jacobs und Siegbert Peetz. Stuttgart-Band Cannstatt: Frommann-Holzboog, 1976 ff.

其中最重要的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翻译出版,力争成为一套较完备的精品集。从我们的现有规划来看,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已经有二十卷的规模,而如果这项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还会在这个基础上陆续推出更多的卷册(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整理出版的晚年谢林的各种手稿)。也就是说,中文版《谢林著作集》将是一项长期开放性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更多支持。

本丛书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谢林著作集》的翻译和研究”(项目批准号 15JJD720002)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先 刚

2016年1月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

译者序

谢林于1802年夏季学期在耶拿大学开设了“学术研究方法论”这门课程,翌年又将其讲稿出版。这门课程和这部著作在当时造成了巨大影响,究其主要原因,大致就如谢林自己归结的那样:首先,它对于“随后的或至少是未来的学术机构的建制”提供了重要启发;其次,它以一种“更适合普遍理解的讲授方式”阐述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视角下的科学整体以及这个整体与科学的各个特殊分支之间的关系(V, 209)。

谢林在本书中所说的“学术机构”(Akademie),不是指那种以单纯研究为导向的“科学院”,而是如这个词语的原型——柏拉图的“学园”——所标示的那样,指一种兼备科研和教学用途,同时肩负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的文化机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ät)。相应的,本书中的“学术研究”(akademisches Studium)也不仅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且意味着“大学里面的学业”,而谢林在这里提出的“方法论”构想,既是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的指导,也是对于大学里面的教学制度的具体安排。

诚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们而言,七百多年前已经诞生的大学算不上什么新鲜事物,然而在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大学虽然也在缓慢地进步,但在总体上并未摆脱最初的行会气息,而且其主导精神完全是“实用至上”,因此整个大学里面充斥着迂腐的学究和那种完全以谋生为目的的“面包学者”,至于那些最具有聪明才智的人,几乎都是在大学之外活动。

谢林并不否认大学一直发挥着“传承知识”的作用,只不过这些知识一方面只是意味着见多识广,另一方面支离破碎,以致人们完全遗忘了“知识本身”亦即“科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要改变这个局面,首要的责任落在“学术机构的永恒组成部分亦即教师”(V, 228)身上。大学教师要赢得社会和学生的尊重,自己必须配得上这份职业,即他们必须首先通过精神领域的辛苦劳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教师。这里看起来有一个悖论,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和教师不可能从天而降,而是只能由已有的陈腐学术机构培育出来,这又如何可能呢?谢林不赞同那种认为简单地通过清洗或“换血”就解决问题的幼稚想法,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的关键仅仅在于学术自由:“人们只需给予这些人精神上的自由,不要用一些根本不适用于科学关系的顾虑来限制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教师就会自己教育自己,他们不但能够满足那些要求,而且反过来有能力教导别人。”(V, 228-229)接下来的问题当然是,这些教师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做到自我教育?在谢林看来,学者应当自觉地融入“普遍精神”,认识到各种专门的科学都是一种绝对科学(谢林亦称之为“原初知

识”)的个别呈现,从而在普遍理念的指引下揭示出每一门特殊科学的真正内涵,并且与其他科学融会贯通——这绝不是意味着贬低特殊科学,将其仅仅当作绝对科学的手段,而是指“在整体的精神里面对待自己的特殊专业”,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够一方面把自己的特殊领域当作自在的目的本身,另一方面恰恰更好地呈现出这个特殊领域里面的普遍者和理念(V, 232)。

大学要获得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必须得到国家的认可。众所周知,大学和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是国家的工具,都必须为国家服务。古往今来莫不如此。谢林一方面承认,国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制造一种“内在的分裂”,即“通过把个别天赋孤立起来并使之相互对立而形成的分裂;国家必定会压迫如此众多的个体性,把他们的力量导向如此众多不同的方面,以便把他们改造成对国家自身更为有用的工具”(V, 235)。但另一方面,谢林也指出,国家绝非仅仅有这个目的,而是“也愿意看到学术机构确实是一些具有科学意义和价值的机构”(V, 229),退一万步讲,即使要培养工具,最好的办法也是通过“科学”而进行。就此而言,“只要国家追求的是最优秀的东西,它就必然会追求理念的生命,追求一种最为自由的科学运动”(Ebd.)。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当,并且能够容忍科学在大学里面行使自治权,尤其是让那些最优秀的知识精英掌权,让各种喧嚣鼓噪的浑水摸鱼者和倚老卖老的平庸之辈退位。“科学王国不是民主制,更不是寡头制,毋宁说,它是最高贵意义上的精英制”(V, 237)。

科学的精英王国在建制上依赖于科学自身的结构。谢林

追随笛卡尔的观点,把整个科学比喻为“原初知识”逐步生枝发芽而长成的一棵巨大的“知识之树”。(V, 215)无疑,这里的“原初知识”就是哲学,特别是那种在不同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的“同一性哲学”,因此她是所有别的科学的根基和归宿。在本书中,谢林用整整三讲的内容专门讨论哲学研究的意义和独特方法,驳斥那些流行的针对哲学的反对意见,尤其是坚决捍卫了哲学相对于各种“官方科学”(神学、法学和医学)而言的独立性和优越性。传统的大学由哲学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构成,其中哲学系是“低级系”,仅提供基础的逻辑思维训练,而直接为意识形态或生活实践服务的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则是“高级系”。康德在1798年的《系科之争》(*Der Streit der Fakultäten*)中首次挑战后面三个系(尤其是神学系)的权威,指出它们应当接受作为“自由科学”的哲学的监管和批判,因此哲学系才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级系”。与此相反,谢林却承认“神学系必定是第一系科和最高系科”,“至于哲学系,我的看法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系。”(V, 284)这些说法乍看起来与谢林全力推崇哲学的做法完全相左,但实际上,谢林的真正观点是,哲学和艺术既然是自由科学的典范,那就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系科的范畴,因此它们应当形成一个“自由联盟”或“艺术联盟”(Collegium Artium),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人文学院”,而人文学院应当是大学里面具有最高地位的一个独立王国。(Ebd.)

除了哲学之外,按照各门科学在观念世界里面的高低层次

和内在秩序,谢林依次讨论了数学、神学、历史学、法学、普遍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普遍的有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最后讨论了艺术科学与整个学术研究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谢林对于各门科学提出了大量深刻洞见,尤其是其中关于基督教、神学、艺术的许多重要思想一直延续到他晚年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这些洞见和思想如此之丰富,可以说任何概要都比不上让读者亲自去领略一番。正如谢林自己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大纲可以说代表着—部普遍的科学百科全书。”(V, 247)通过百科全书的形式来呈现出大全一体的世界,这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致追求,无论是早先诺瓦利斯的《大全装订书稿——百科全书素材》(*Das Allgemeine Brouillon. Materialien zur Enzyklopädistik*, 1798/1799),还是后来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大纲》(*Grundriß der 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817),都是其相应的体现。当然,谢林同时也承认,由于讲授课形式的限制,他在这里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一个“立足于最高本原,以最严格的方式推导出来的知识体系”,而是希望“呈现出全部科学相互之间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是那个内在的、有机的统一体通过大学的外在部门而维系起来的”。(Ebd.)真正说来,谢林在这段时期最完整的关于体系的阐述是他1804年在维尔茨堡大学讲授的《全部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的体系》(*System der gesamten Philosophie und der Natur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亦称“维尔茨堡体系”),但这个体系阐释的重心已经不在于各个“学科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

和“大学的外在部门”的关系。

尽管如此,谢林在本书里面提出的大学的“科学使命和道德使命”,还有他对于大学内部的各门科学之间的有机关系的详细阐述,都在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威廉·冯·洪堡的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普鲁士的开明政府的支持下,洪堡于1809年筹建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即柏林大学,而谢林的《学术研究方法论》(1803)和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1794)及康德的《系科之争》(1798)一起,被看作是洪堡的教育思想的理论指针。

除了《学术研究方法论》之外,本卷亦收录了谢林于1802年发表的几篇重要论文,即《论自然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关系》《论哲学中的建构》《论哲学视域下的但丁》。这几篇论文涉及的问题与《学术研究方法论》相互呼应,更全面地展示了谢林的“同一性哲学”的思想。

本卷中的《学术研究方法论》一书曾经在我的一门德国古典哲学原著精读课上被用作教材,以训练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和准确理解德语原著的能力。这部分的翻译就是在这门课上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倪逸德、施林青、阿思汗、孔博琳、邱信翰等同学对我的译稿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改意见,在此提出感谢!

先 刚

2018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目 录

论自然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关系(1802)·····	1
论哲学中的建构(1802)·····	27
论哲学视角下的但丁(1802)·····	61
学术研究方法论(1803)·····	79
人名索引·····	256
主要译名对照·····	259

谢林著作集

论自然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 哲学的关系

(1802)

F. W. J. Schelling, *Ueber das Verhältniß der Naturphilosophie zur Philosophie überhaupt*, in ders. *Sämtliche Werke*, Band V, S. 106-124.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6-1861.

